

# 唐代景教的传教策略及盛衰得失

叶 蓉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 景教自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传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因皇帝灭佛而同遭禁绝,在华传播长达二百多年。可是,景教在被禁之后,立刻就从中原大地上销声匿迹了,直到明代景教碑出土之后,学者们才逐步挖掘出它的传播历史。是什么原因致使景教在中华历史文化中被彻底湮没了将近八百年呢?文章拟从其传教策略上寻找一些答案。

**关键词:** 全盘汉化;拿来主义;上层路线

**中图分类号:** B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50(2008)01-0040-03

**收稿日期:** 2007-11-02

**作者简介:** 叶蓉,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斯洛伐克考门斯基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研究所博士。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亦称“景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由波斯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传至长安。出土于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 1625 年)、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景教的传入历程作了详细记录。从景教初入中国到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所发的诏谕,唐代官方典籍一直称之为“波斯经教”,但在此后三十六年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里,其名称则摇身一变成了“景教”,后历代学者皆沿用此名。从景教碑对教名的诠释——“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来看,其教名是按照教义在人心中所起的“功用”来命名的。汉语的“景”字是个形声字,从日京声,本义是“日光”。因此,“昭彰”之义乃是“光明”。可见,景教碑采用了一个完全汉化的名称,不像后来的“基督”那样充满洋味。对于景教名称的变化,作者曾在《唐代景教之地域背景及名称质疑》一文中做过探讨,在此不再赘述。但是,从其教名的汉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景教向中国文化的主动靠拢。唐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同样遭到灭顶之灾。景教遭禁灭时,景教碑被掩埋入土,经典文献也被坚壁秘藏,此后该教派便在中原大地上销声匿迹了。景教的最终灭迹,正是跟它的过度中

国化有着密切关联。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证实。

第一,在教义的阐释上采取拿来主义,以儒释道的现成理念释耶。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便极尽努力,追求从名到实的中国化。

首先,在文词的使用上,景教不像佛教东来时那样为宣讲教义而自创详尽独特的阐释系统,而是几乎全盘采用了拿来主义,汉语表达形式、儒释道之概念术语,只要沾边,尽为所用。有学者把这种方式称为“语义的采纳(Linguistic adoption)”。例如:在教义阐释上,景教直接借用佛、道用语。景教碑把神职人员称为“僧”,碑文撰写者为“大秦寺僧景净”,碑中众多人名之前都被冠以“僧”字,有“僧罗含”、“僧普论”等等。把教堂称为“寺”,碑铭正文中有关于初来教士“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的记载,也有发展壮大时“寺满百城”的夸耀。碑文中甚至采用了通常用于指佛寺的“王舍之城”来比喻景教教堂,例如碑文对教士伊斯的记载:“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有“寺”有“僧”,乍读起来使人误以为是一块佛教碑刻。碑文中也杂有一些颇有道教色彩的语句,例如:“浑元之性,虚而不盈”、

“鼓元风而生二气”、“法流十道”、“共振玄纲”等。19世纪末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内蒙古、泉州等地景教遗物的发现,学界对景教的研究视野得到了拓展。研究者在比较了汉文与叙利亚文的景教经典之后,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叙利亚文记载的经文义理十分接近正统的天主教,而汉文所表达的内容则夹杂着大量的佛、道、儒三家的用语及观念,有的甚至使其原有教义面目全非。比如,年代最早的汉语景教文典《序听迷诗所(诃)经》中大量诸如“果报无处不到”、“善有善福,恶有恶缘”、“命如转烛”、“众生布施”之类的用语,极富佛、道色彩,引人联想,致使经文失却了其基督宗教经典的真义。难怪后代出现了景教经典被误编在佛教文集中或被视为道经的笑话。

其次,景教在传教过程中也十分注重调和其教义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努力使自己的宣道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这一点在《序听迷诗所(诃)经》对忠孝关系的阐释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一切众生,皆取圣上进止……须怕父母、只承父母。将比天尊及圣帝。以若人先事天尊及圣上,及事父母不阙,此人于天尊得福。不多此三事,一种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为此普天在地并是父母行。据此,圣上皆是神生,今世虽有父母见存。众生有智计,合怕天尊及圣上,并怕父母,好受天尊法教”。这段阐释将儒家“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道统与景教教旨紧密糅合。

另外,在信仰模式上,景教亦努力追求与中国传统道德标准的一致,树立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信仰典范,使自己的教士典型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完人”看齐。景教碑文关于教士典范“伊斯”的记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赐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戡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能散禄赐,不积于家。献临恩之颇黎,布辞憩之金罍。或仍其旧寺,或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翬斯飞。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饒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

碑。以扬休烈”。这里所褒扬的教士伊斯,人格高尚、仁爱忠义、仗义疏财、善待贫苦。这样的人物流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完人”形象。景教碑提倡教徒“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也就是倡导舍己以求大众利益、律己以励个人心志、敬虔以致他人幸福。这也与儒家文化的仁爱、忠恕、克己爱人如出一辙。可见景教教义在本土化上所作的努力是比较彻底的。

第二,走上层路线,盛衰取决于皇室。景教初入中华,便与统治阶层发生了密切关系,体会到了获得皇室好感与支持的重要性,将上层路线作为传教的方针,尽心为皇室效力,企求借助皇室的力量介入上层社会。对此,景教碑碑文有着多处记载,例如:强调皇帝对入华教士的礼遇:“……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渲染皇室对景教的支持:“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春团”。“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饌以光景众”。歌颂朝政、表达期望通过朝廷参与社会建设的意图:“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无愧心。至于方大而虚,专静而恕,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犹,汲引之阶渐也。若使风雨时,天下静,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殁能乐,念生响应,情发自诚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表彰景教徒伊斯在安史之乱中挺身而出,“效节于丹庭”、“策名于王帐”,在“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帐下“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建立功勋,获“赐紫袈裟”。

可见,景教自打进入中国,就从太宗皇帝的优待里尝到了走上层路线、依靠统治者的政令传播教义的好处。这使其过分地依赖统治者的支持,甘心情愿地做皇室的教化工具。然而,景教在尽力迎合统治者,并努力使自己的教义汉化以适合正统思想的同时,并没有重视在社会上广泛发展信徒。在景教碑中只提到景教怎样在各代皇帝支持下传播,并未提及具体发展信徒的情况。在碑文里,除了教士典范伊斯,我们对景教在唐

代的大致信徒人数一无所知。

到景教碑建立之时(781 年),在皇帝的恩宠之下,景教在华已经历了 140 多年的传播和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即碑文所描述的“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胜景。但尽管如此,在与佛道二教的竞争中,景教仍然困难重重。景教碑记载了景教与佛道二教的两次争斗:“圣历年(698—699),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712),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景教显然处于劣势,依靠教内僧首、大德与教外贵绪、高僧“共振玄纲”,才得以“俱维绝纽”。

建碑之后,景教又经历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几朝皇帝,但并没有取得巨大发展,一直是与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又称明教)并列的唐代三夷教之一。会昌五年(845 年),武宗因经济原因(“恶僧尼耗蠹天下”)而下令灭佛,景教等外来宗教也都难逃厄运。“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并毁天下佛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分后,遵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又“八月制,……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人,收充两税户。……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此后,景教在中原大地上就绝迹了,仅在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流传。

可见,依附上层统治,盛衰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一旦失宠,便难免遭遇厄运。

#### 注释:

叶蓉.唐代景教之地域背景及名称质疑[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7,(4):34-38.

唐逸.理性与信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王舍城.本来指古印度的 R'jagrha 城,因释迦牟尼一生在此讲经十数载,收纳众多弟子,故古代汉语中借此表示佛寺,也指其他教派的庙宇。这里指景寺。参见 Jana Benicka:《Chinese Concept of Ancestral Worship System Versus Buddhist Vision of Human Community as Devoid of Kinship Ties?》In: Hubina, M.,Kovac, M., eds.: *Religious Change*. Bratislava: Chronos, 2006.

经文多处写作“迷师诃”,题目作“迷诗所”,是“弥赛亚”(Messiah)的谐音。

赵璧础.就景教碑及其文献试探唐代景教之本色化[A].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论文集)[C].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40.

赵璧础.就景教碑及其文献试探唐代景教之本色化[C].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The Nestorians' Strategies of Popularizing the Religion – Successes and Failures

YE Rong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ichuan Chendu 610031)

**Abstract:** Jingjiao (Nestorians)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ang'an, the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in 635 A.D..In order to adjus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survive after entering China, Jingjiao had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localize itself in China, from its name to its actual being. However, when Tang Wuzong ordered to eliminate Buddhism in 845 A.D. and likewise, Jingjiao was completely banned. Since then, this religion vanished in China with its Stele buried and its scriptures cached.

**Key words:** Localization; Linguistic adoption; Relying on the imperial court